

古代中国与伊朗南部

地区陶瓷贸易管窥

——以安德鲁·乔治·威廉姆森的调查为中心

张 然 翟 毅

内容提要 1968年9月至1971年4月，英国学者乔治·威廉姆森在波斯湾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面调查。他在伊朗南部地区1200余处遗址展开了发掘和地面采集工作，发现了中国陶瓷、近东地区陶器、钱币和玻璃等大量历史遗物，学界称作“威廉姆森藏品”。在东起贾斯克西到布什尔的范围，威廉姆森在200多个考古遗址中发现了3500余件中国陶瓷，其中主要包括长沙窑、邢窑、定窑、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景德镇青花和磁州窑等不同窑址的中国外销瓷。通过对威廉姆森藏品中中国外销瓷的梳理，本文探讨了伊朗南部地区与中国的古代陶瓷贸易状况，简述了从公元9到14世纪伊朗南部地区与中国贸易港口的变化，研究发现中国外销瓷主要分布在伊朗南部沿海地区。此外，作者讨论了中国外销瓷在伊朗南部的贸易路径等问题。

关键词 威廉姆森藏品 中国外销瓷 古代海洋贸易 伊朗南部地区

唐代伊始，中国外销瓷大量出口到西印度洋地区，伊朗南部波斯湾北岸是海洋陶瓷贸易的重要地区。伊朗南部地区的尸罗夫港、基什岛、霍尔木兹王国在中国古文献中都有所提及，说明该地区当时与中外海洋贸易有着直接关系。在考古学方面，除了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在尸罗夫的发掘以外^①，鲜有相关考古发掘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英国考古学家安德鲁·乔治·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波斯湾北岸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其调查结果成为了研究古代中国与伊朗贸易的重要材料。

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的地面调查目前被认为是研究伊朗境内萨珊王朝和伊斯兰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根据威廉姆森的笔记，他访问了近1200处伊朗南部的古代遗迹或遗址。他的调查藏品包括17000余片陶

① Whitehouse, D., 1968, "Excavations at Siraf: First Interim Report", in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6, pp: 1-22; 1969, "Excavations at Siraf: Second Interim Report", in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7, pp: 39-62; 1970, "Excavations at Siraf: Third Interim Report", in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8, pp: 1-18; 1971, "Excavations at Sira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n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9, pp: 1-17; 1972, "Excavations at Siraf: Fifth Interim Report", in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10, pp: 63-87; 1974, "Excavations at Siraf: Sixth Interim Report", in *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 Vol.12, pp: 1-30.

瓷残片、5000余件玻璃以及钱币等其他标本，其中中国唐至晚清时期的陶瓷器达3400余片^{〔1〕}。

2016年以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共同整理了威廉姆森藏品中的中国外销瓷。本文根据整理的初步成果，拟尝试对古代中国与波斯湾北岸地区的陶瓷贸易进行初步分析。

一 威廉姆森与其调查简介

安德鲁·乔治·威廉姆森1945年生于英格兰，早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学习西班牙语与西班牙历史文化等课程。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对伊斯兰文化产生了兴趣，随后他考入牛津大学学习现代史。大学期间威廉姆森开始接触考古学，并在英国参加了数次考古实习。在那个年代，英国人还可以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甚至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自由考察旅行。1968年左右，威廉姆森首次造访伊朗，并对伊朗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在伊朗多地进行考古实习，其中包括跟随大卫·怀特豪斯在尸罗夫港进行考古发掘。同年，他返回牛津并开始专门研究伊朗历史与考古，而且计划在伊朗地区的地面调查工作。

威廉姆森对于自己的调查计划有着壮志雄心：西到美索不达米亚、东至巴基斯坦境内、南达波斯湾、北通伊朗高原腹地，他希望借由古文献与古代地图来调查古代伊朗历史时期的重要遗迹和商路。在早年的调查中，威廉姆森最为得意的是他在锡尔詹(Sirjan)的考察与发现，这座9至11世纪的克尔曼(Kirman)中世纪古城仍留存着古代民居、礼拜寺和城墙等遗迹。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调查了布什尔(Bushehr)，并首次发现了布什尔萨珊时期的遗址；并重点考察了里沙赫尔(Rishahr)的港口重镇、米纳布(Minab)地区等。1969年，威廉姆森结识了美国考古学者玛莎·普利克特(Martha Prickett)，合作展开伊朗南部的考察。威廉姆森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历史时期，而普利克特则对史前遗址更为感兴趣，因此他们在考察中相互弥补，使得考察内容更加完整。

1973年，威廉姆森出任阿曼苏丹国文物局局长，计划调查阿曼南部佐法尔省(Dhofar)。虽然佐法尔有着大量的考古遗迹，但是因为时值阿曼内战，工作并未展开。1975年内战结束，威廉姆森决定重启佐法尔考察计划，但不幸在考察中遇到地雷而遇难，年仅30岁。

随后，普利克特整理了威廉姆森的藏品，并由威廉姆森的父母捐献给英国牛津大学阿什摩林博物馆，部分藏品由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收藏。因为这项调查是由威廉姆森与普利克特联合主持的，其藏品全名应为“威廉姆森与普利克特调查藏品”，本文简称为“威廉姆森藏品”。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许多学者就威廉姆森藏品进行过不同角度的研究：1970年代，参与调查的普利克特曾经一度想结集出版威廉姆森藏品，可惜未果^{〔2〕}。1981年，英国考古学家彼得·摩根(Peter

〔1〕 Seth Priestman, *Settlement & ceramics in Southern Iran: An analysis of the Sasanian & Islamic periods in the Williamson collection*,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urham University, 2005, Figure 3.

〔2〕 Seth Priestman, 2005, pp.20.

Morgan)也曾再次尝试出版,可惜因为版权等问题,最终仅以科尔曼省锡尔詹地区的藏品作为研究重点,于1987年发表部分研究内容⁴¹。随后彼得·摩根又对威廉姆森藏品中米纳布地区的中国陶瓷进行研究,确定了旧忽鲁谟斯王都的所在地,以及探索了忽鲁谟斯王国迁至霍尔木兹岛的历史⁴²。法国学者阿柯塞勒·胡热尔(Axelle Rougeulle)在博士论文中梳理了环印度洋中国外销瓷出土、采集的情况,重点引用了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沿海地区遗址中采集的藏品,并探索了伊斯兰世界与远东地区中世纪的贸易往来⁴³。2002年,英国考古学家德瑞·康耐特(Derek Kennet)与赛斯·普里斯曼(Seth Priestman)建立了威廉姆森藏品研究项目(The Williamson Collection Project)⁴⁴。普里斯曼完成了对威廉姆森藏品的系统梳理,将其中的陶瓷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与分析⁴⁵。

近年,中国考古学家对于威廉姆森藏品也逐渐开始重视起来。在普里斯曼研究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与杜伦大学联合考古队对威廉姆森藏品中的中国陶瓷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在实地考察过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后,利用威廉姆森藏品数据,对于伊朗古港口变迁、郑和在波斯湾航海线路、“马可·波罗罐”等课题进行了研究⁴⁶。

二 威廉姆森调查的局限性与整体概况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波斯湾地区的地面调查主要以区域调查为主。而威廉姆森调查在当时具有前瞻性,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区域调查的界限,在伊朗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另外,同是在伊朗南部进行的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坦因(A. Stein)主要依据文献记载调查,路线比较单一。这种传统

〈1〉 Peter Morgan, Janet Leatherby, "Excavated ceramics from Sirjan", Allan & C. Roberts ed., *Syria and Iran: three studies in medieval ceramics*, *Oxford Studies in Islamic Art*, 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3-174.

〈2〉 Peter Morgan, "New thoughts on Old Hormuz: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Hormuz region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ran*, 29, 1991, pp.67-83.

〈3〉 Axelle Rougeulle, *Les importations extrême-orientales trouvées sur les sites de la période abbassid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commerce moyen-oriental au Moyen-Age*, Ph. D. Thèse, Université Paris IV, vol.3, 1991.

〈4〉 Seth Priestman, Derek Kennet, "The Williamson Collection Project: Sassanian and Islamic pottery from Southern Iran", *Iran*, 40, 2002, pp. 265-267.

〈5〉 Seth Priestman, 2005; Seth Priestman, *A Quantitative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Ceramic Exchange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Western Indian Ocea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13.

〈6〉 德里克·康耐特、张然、赛斯·普里斯曼:《近东地区考古已发现的龙泉窑瓷器——英国威廉姆森藏品及斯拉夫遗址调查藏品中的龙泉窑青瓷简介》,中国古陶瓷学会编:《龙泉青瓷研究》页447—457, 2011年; Ran Zhang, *An Exploratory Quantitative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and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Ceramics Trade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AD c. 800-1500*,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Durham, 2016; 林梅村:《波斯湾古港的变迁——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一》,《紫禁城》2012年第4期, 页24—33; Lin Meicun, Ran Zhang, "Zheng He's voyages to Hormuz Isl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tiquity*, 89(344), 2015, pp.417-32; Lin Meicun, Ran Zhang, "A Chinese Porcelain Jar Associated with Marco Polo: A Discussio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018, pp.39-56.

调查方法可能会受到历史文献的引导而产生局限性。与之相比，威廉姆森的调查方法更为系统化和标准化。在结合了传统考古调查方法的同时，更多通过实地观察地理地貌，对调查地区的文化遗迹进行了详细和标准化的记录^{〔2〕}。

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的调查区域十分广泛，并且尽可能地收集了他认为有价值的考古遗物，但其调查也有着其局限性。主观上，在收集这批藏品的过程中可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其调查策略虽然是标准化和系统化的，但是与现代景观考古踏查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尚未采用GIS等现代定位技术；客观上，因为威廉姆森的不幸逝世，他的许多笔记和他的研究思路无法被解读。因此在我们现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就难免损失一些藏品的信息。

在调查中，威廉姆森对调查的不同区域进行了定义和编号。但是因为他的离世，他对区域的具体定义则无从而知。所以，他的区域编码成为了了解伊朗南部历史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信息。由于威廉姆森留下的信息不够完整，英国考古学家赛斯·普里斯曼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复原了大部分考察遗址和调查遗物的具体地点。重新整合的遗址区域 / 地点有121处，包括300余处调查点 / 遗址群。11665片陶瓷器有出土地点，占整体藏品的72%^{〔3〕}。

[表一]列出了威廉姆森调查的主要区域，分布在伊朗的霍尔木兹甘省、法尔斯省、克尔曼省和布什尔省。其中少数遗址位于内陆，大多数数据点位于海岸线附近。这些据点的时间范围覆盖了从萨珊王朝至公元18世纪。根据普里斯曼的分析，威廉姆森藏品整体年代主要分布在两个时间段，分别是萨珊王朝时期(3至6世纪)和伊斯兰中后期(11至17世纪)。从分布状况而言，萨珊时期的陶瓷器主要分布在布什尔岛及周边，伊斯兰中后期的陶瓷器主要分布在米纳布地区。说明伊朗南部的古代沿海贸易中心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即从布什尔转到了米纳布^{〔4〕}[图一]。

[表一] 威廉姆森调查区域代码及其所指地理范围^{〔5〕}

区域代码	区域范围	英文
A	阿巴斯港至伦格港	Rud-i-Shur to bandar-i-Lengeh
AA	霍尔木兹岛	Hormuz Island
AE	基什岛	Kish Island
B	伦格港及周边	Lengeh to Qalat-i-Abdl Rahman
D	奈班德海湾	Neran to Naband
F	尸罗夫港附近	Tahiri to Rud-i-Mond

〔1〕 原图引自：Seth Priestman, 2005, pp.46: Figure 2.

〔2〕 Seth Priestman,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Stem and Williamson's surveys compared", H. E. Wang ed., *Sir Aurel Ste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Museum Study Day*, 2002, London: British Museum Occasional Paper, 2004, pp.29-35; Seth Priestman, 2005, pp.25-26, 30-31.

〔3〕 Seth Priestman, 2005, pp.45.

〔4〕 Seth Priestman, 2005, pp.100-101.

〔5〕 Seth Priestman, 2005, pp.364: Region Refixes.

(续表一)

区域代码	区域范围	英文
H	布什尔半岛	Bushehr Peninsula
J	阿巴斯港及周边	Rud-i-Shur to Minab
K	米纳布地区	Minab delta
L	贾斯克地区	Minab to Jask
P	哈利勒河谷	Halil-Rud Valley
Q	朵兹丹山谷	Rudan and Bulak
R	科尔曼南部	Southern Kerman
S	锡尔詹地区	Sirjan Survey
V	设拉子地区	Siraz area
Z	巴姆地区	Bam/Rayen

三 威廉姆森调查中中国陶瓷种类与分布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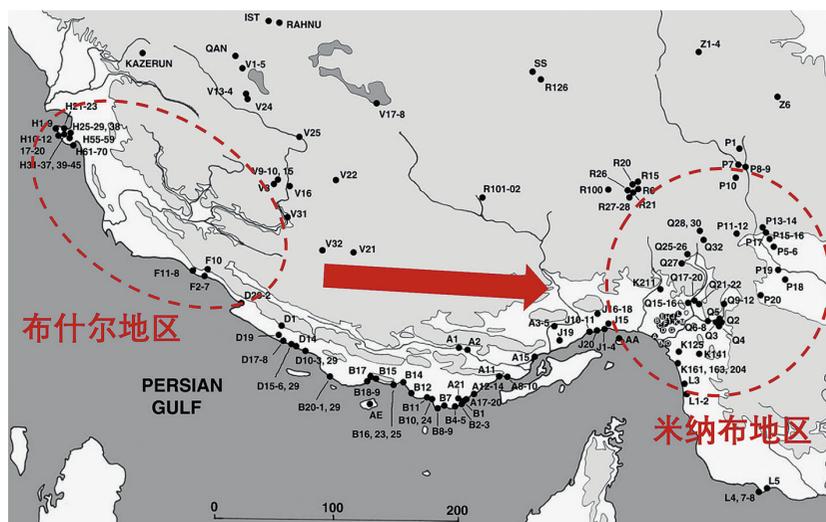
在威廉姆森调查所得标本中，以中国标本为主的东亚陶瓷有3386片，约占标本总量的20%。中国外销瓷的比例与其他波斯湾或西印度洋地区遗址调查或考古发掘相比是十分高的。这可能主要因为威廉姆森在调查中有意地挑选了高质量且容易辨识的中国外销瓷。这些中国陶瓷器出自伊朗南部约219个调查点，年代为唐至清代，主要集中于霍尔木兹岛(AA)、米纳布地区(K)和基什岛(AE)。

威廉姆森藏品中的中国陶瓷器已有文章详细介绍^{〔2〕}，这里简略介绍(〔图二〕、〔表二〕)。从调查的西部向东部延伸，威廉姆森调查中出土中国陶瓷的区域主要有：

1. 霍尔木兹甘东部(L、K与Q区域)与霍尔木兹岛(AA区域)

霍尔木兹甘东部以及霍尔木兹岛是威廉姆森藏瓷最集中的采集区域。其中靠近波斯湾入海口的米纳布地区为K区域，靠近内陆的朵兹丹山谷(Dozdan Valley)地区为Q区域，位于米纳布地区东侧的贾斯克地区(Jask)为L区域，霍尔木兹岛为AA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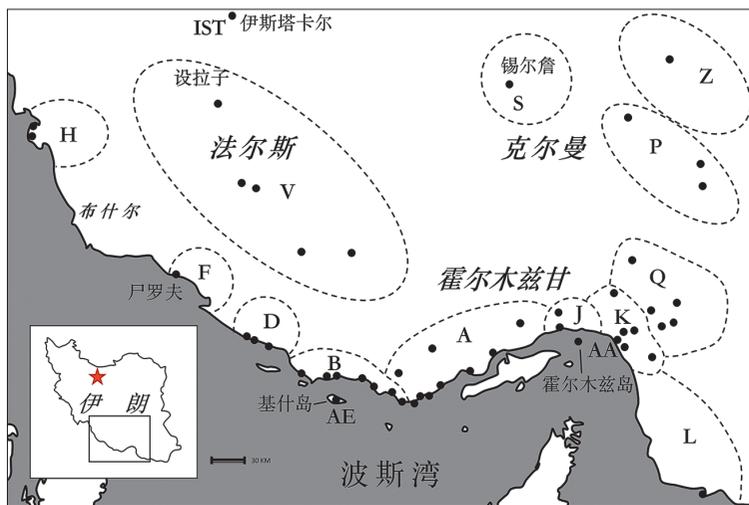
〔图一〕威廉姆森调查据点分布图与伊朗南部的古代沿海贸易中心的变迁^{〔1〕}



〔1〕 原图引自：Seth Priestman, 2005, pp.46: Figure2.

〔2〕 翟毅、张然：《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年第5期。

〔图二〕威廉森调查中国外销瓷的主要遗址分布



2. 霍尔木兹甘西部 (A、B、D与J区域) 与基什岛 (AE区域)

威廉姆森在霍尔木兹甘省西部地区的遗址采集点基本沿海岸向西分布。最东边的是毗邻米纳部地区的J遗址区域，以阿巴斯港(Bandar Abbas)为中心。由此向西A、B与D遗址区域依次顺延至奈班德海湾(Nayband)。AE地区为基什岛(Kish Island, 《诸番志》称“记施”)。

3. 布什尔地区 (F与H区域)

编号F、H的区域在布什尔省境内，F区域即著名的尸罗夫港(Siraf)及周边地区，H区域

是布什尔半岛(Bushehr)。F区域，共有14处遗址出土了陶瓷残片，其中2处采集到中国标本。在全部173片陶瓷遗物中，21片为中国陶瓷，占总数的12.3%；H区域，共有66处遗址出土了陶瓷残片，共计1578片，其中仅有8处采集到中国陶瓷，共83片，占总数的5.3%。

4. 内陆地区 (P、S、Z、V与IST区域)

威廉姆森在伊朗内陆的调查采集主要分布在伊朗南部的克尔曼省(区域P、S、Z)和法尔斯省(区域IST与V)。整体而言，内陆采集的中国陶瓷数量十分稀少，均未超过各遗址点陶瓷采集总量的4%。

〔表二〕威廉姆森调查发现中国外销瓷的调查点与陶瓷数量、比例

区域	内陆/沿海	出土陶瓷遗址数	出土东亚陶瓷遗址数	比例	出土陶瓷数	出土东亚陶瓷数	比例
L	沿海	9	1	11.1%	41	2	4.9%
K	沿海	182	131	72.0%	5181	1943	37.5%
AA	沿海	5	5	100.0%	666	540	81.1%
J	沿海	16	6	37.5%	156	35	22.4%
A	沿海	16	9	56.3%	521	177	34.0%
B	沿海	21	16	76.2%	517	189	36.6%
D	沿海	20	6	30.0%	399	24	6.0%
AE	沿海	8	8	100.0%	413	286	69.2%
F	沿海	14	2	14.3%	173	21	12.1%
H	沿海	66	8	12.1%	1578	92	5.8%
Q	内陆	24	6	25.0%	1088	19	1.7%
P	内陆	21	3	14.3%	1893	12	0.6%
S/SS	内陆	17	8	47.1%	799	27	3.4%
V	内陆	26	7	26.9%	333	13	3.9%
Z	内陆	5	2	40.0%	251	5	2.0%
IST	内陆	1	1	100.0%	27	1	3.7%

四 讨论

1. 伊朗南部港口与中国贸易的关系变化

关于波斯湾古港口的变迁和与中国古代的贸易往来，许多学者都已经做过讨论¹，下面以威廉姆斯藏瓷中中国陶瓷标本的分布为着眼点，从宏观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因为威廉姆森在布什尔省调查时，英国考古学家怀特豪斯正在尸罗夫港发掘，本文也以怀特豪斯的发掘出土数据作为参照²。

在威廉姆森的调查中，对比尸罗夫(包括怀特豪斯的发掘)、基什岛、米纳布地区和霍尔木兹岛采集或出土中国外销瓷的变化[表三]，可以看出这些地区(港口)与中国贸易的在不同时期的活跃程度变化(绿色为活跃、红色为不活跃)。唐代，尸罗夫港扮演着与中国贸易的重要角色，出现了一家独大的局面。到了宋代则出现了变化，虽然尸罗夫港仍是主要贸易港口，但是基什岛和米纳布地区都出现了与中国贸易的发展态势。

[表三] 尸罗夫、基什岛、霍尔木兹岛和米纳布地区的中国外销瓷出土数量与比例分布表(比例为分期中国外销瓷数量/总中国外销瓷数量)

遗址	代码	唐	宋	元	明	清
尸罗夫	F	157(31.6%)	199(40.0%)	51(10.3%)	90(18.1%)	0.0%
基什岛	AE	4(1.7%)	26(11.1%)	144(61.3%)	60(25.5%)	0.0%
霍尔木兹岛	AA	0.0%	2(0.4%)	22(4.5%)	457(93.1%)	9(1.8%)
米纳布	K	12(0.7%)	225(13.0%)	554(31.9%)	839(48.4%)	100(5.8%)

元代时期，基什岛与中国贸易的活跃年代最为活跃，与米纳布地区超越了尸罗夫港，两者之间平分秋色，可能有着竞争关系。到了明代，基什岛发现的中国外销瓷仅为龙泉青瓷，没有发现一片青花瓷，说明其与中国的陶瓷贸易在明代已经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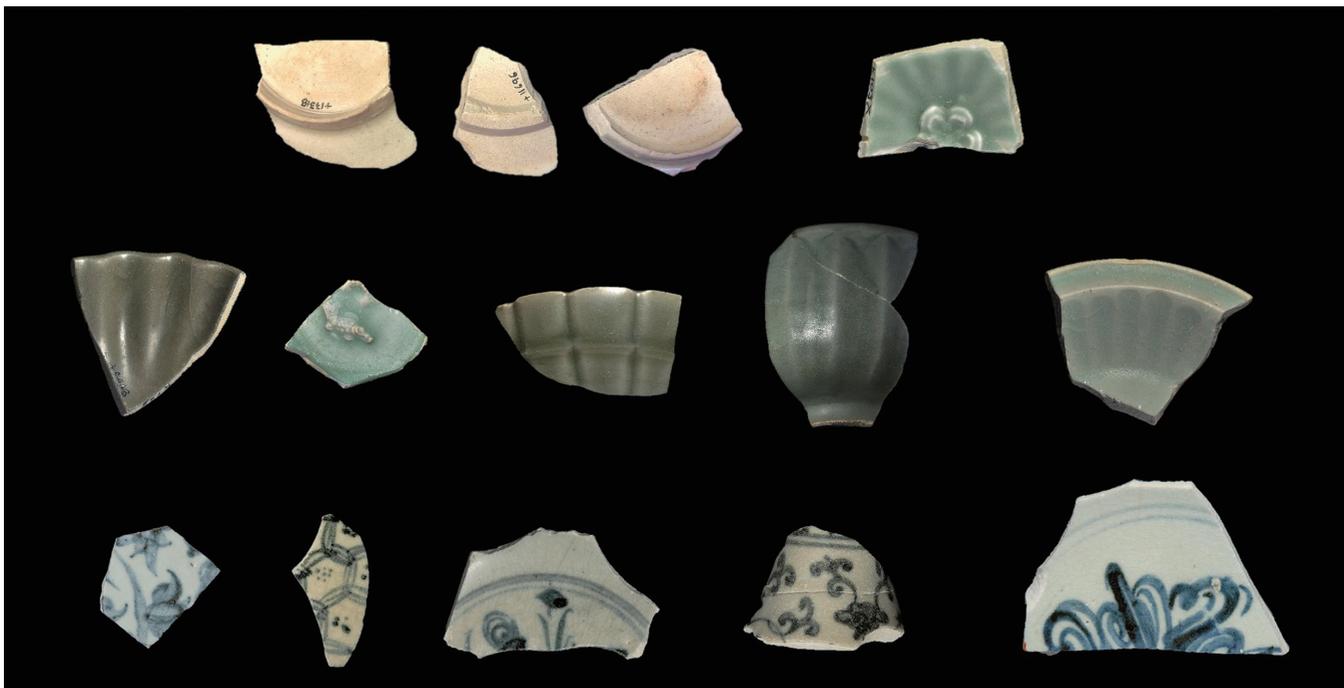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霍尔木兹岛与中国贸易从元代开始(以出土的龙泉青瓷来看以元代中后期为主，见[图三]，明代达到了顶峰。米纳布地区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主要集中在元明之际，元明时期出土的中国陶瓷器数量基本大致平均，明代略多。

结合调查与历史文献可以看到，位于今伊朗布什尔省东南海滨的尸罗夫港是阿巴斯王朝在波斯湾最

<1> Jean Aubin, 1959: La ruine de Siráf et les routes du Golfe Persique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2(7), pp.295-301; Derek Kennet,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Ras al-Khaimah and the 14th- century Hormuzi economic boom in the lower Gulf", *Proceedings of the Seminar for Arabian Studies*, 32, pp.151-164; 前揭《波斯湾古港的变迁——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一》; David Whitehouse, "The decline of Siraf",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Symposium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ran*, 2nd - 7th November 1974, Tehran, 1975, pp.263-270; David Whitehouse, "Maritime trade in the Gulf: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World Archaeology*, 14(3), 1983, pp.328-334; Donald Whitcomb, "A Sequence of Iranian Ports: Islamic Archaeology in the Persian Gul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of Iranian Archaeologists*, 2(3), 2016, pp.47-53.

<2> 怀特豪斯在尸罗夫的发掘出土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陶瓷器物部分在大英博物馆。此处引用的是怀特豪斯发掘时在遗址A区的出土陶瓷记录，见Seth Priestman, 2013, pp.236-245。

〔图三〕威廉姆森在米纳布地区所采集的中国陶瓷标本



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也是与唐代中国贸易的终点港。《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记载了从广州出发到达东南亚以及近东地区的航路^{〔1〕}。然而这些航路的记载大多数是靠收集在唐的阿拉伯商人的讲述总结出来的，并且鲜有史料记载在此期间唐朝的商人直接参与了与阿拉伯的贸易^{〔2〕}。

虽然史料记载从10世纪开始，由于大地震的原因尸罗夫港在波斯湾的地位开始动摇，但是调查发现其真正的衰落在宋元之际。一方面，这与来自基什岛猖獗的海盗活动有关，缺乏安全的局势导致大量的物资、人员都流向阿曼的苏哈尔港^{〔3〕}。另外，随着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的强盛，西印度洋贸易的重心从波斯湾转移到了红海地区^{〔4〕}。与此同时基什岛和米纳布地区的中国陶瓷贸易量也显著提高。

宋元之际，基什岛与霍尔木兹王国所统治的米纳布开始繁荣，但尸罗夫港并没有完全没落。尸罗夫发掘出了一定数量的元代中国龙泉青瓷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一点^{〔5〕}。但是此时波斯湾的海洋贸易中心和与中国的贸易已经转移到了波斯湾下游地区，基什岛与忽鲁谟斯王国形成了竞争关系。1330年

〔1〕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新唐书》页1153—1154，中华书局，1975年。

〔2〕 李金明：《唐代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

〔3〕 Jean Aubin, 1959, pp.295-297.

〔4〕 Wiet, G., “Les marchands d’épices sous les sultans mamlouks”, in *Cashiers d’Histoire Egyptienne*, vol. VII (2), pp.81-147.

〔5〕 Jean Aubin, 1953: *Les Princes d’Ormuz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pp.77-137; Morgan, 1991, pp.71-78; Kennet, 2002, pp.161; Fiorani Piacentini, “Merchants-Merchandise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Persian Gulf (Suriyanj / Shahriyaj-Siraf)”, in *Memorie dell’Accademia dei Lincei 9th series*, vol. 2, fasc. 2: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pp.171.

〔图四〕威廉姆森在霍尔木兹岛所采集的中国陶瓷标本



前后，虽然霍尔木兹岛最终击败了基什岛，但因为不堪来自呼罗珊地区突厥军队的侵扰，最终迁到哲伦岛(Jerun)，即现在的霍尔木兹岛⁴¹。

明代早期，忽鲁谟斯王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代，被称作新霍尔木兹王国(New Hormuz Kingdom)，逐渐控制了波斯湾贸易，郑和下西洋时曾造访这里⁴²，并发现了明代初期的官样龙泉窑青瓷，明代红绿彩瓷、黄釉瓷等器物，说明其外销瓷品种丰富，尤其明代红绿彩器和黄釉器在印度洋中国陶瓷贸易中是十分稀少的〔图四〕。在与中国和欧洲贸易的刺激下，新霍尔木兹王国的范围囊括了波斯湾大部分地区，包括霍尔木兹岛、米纳布、阿巴斯港、丽莎赫尔、巴林、阿曼和阿联酋祖尔法地区，成为了印度洋贸易的重要中心⁴³。

2. 沿海与内陆威廉姆森藏瓷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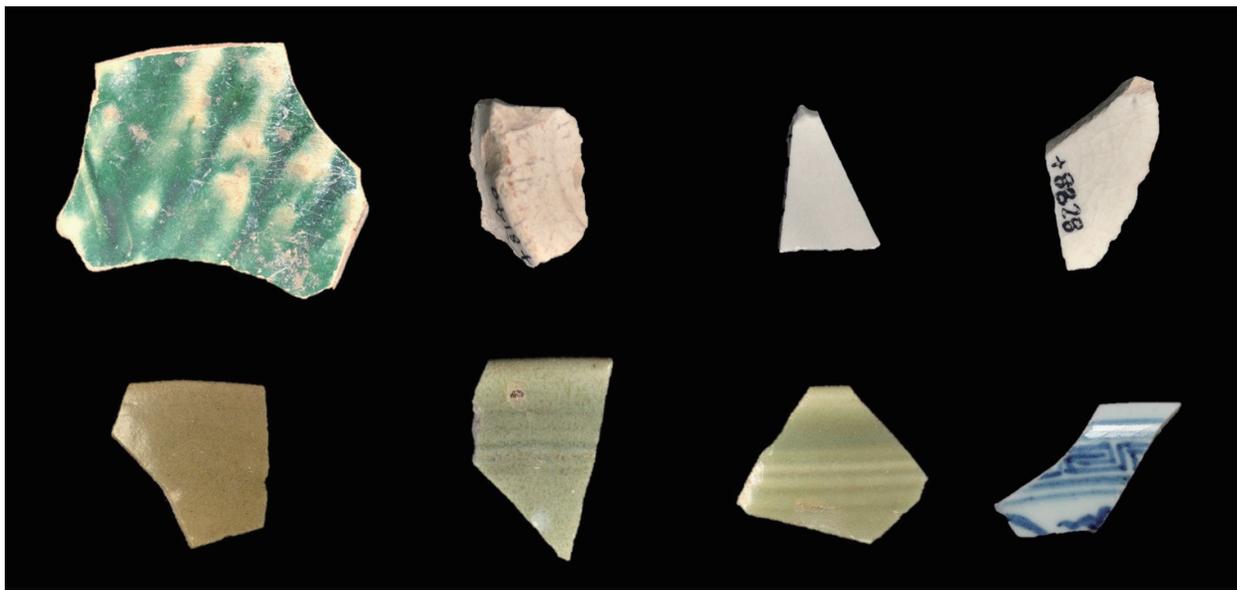
将威廉姆森采集点分为沿海与内陆两类，无论是在东部米纳布、克尔曼地区还是在西部西霍尔木兹甘、布什尔与法尔斯地区，沿海地区能够采集到中国标本的遗址分布更为密集，标本量更大。中国陶瓷

〈1〉 Peter Morgan, 1991, pp.78.

〈2〉 Lin Meicun, Ran Zhang, 2015.

〈3〉 Donald Whitcomb, 2016, pp.51; Donald Whitcomb, "The Archaeology of Oman: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Islamic Period", *Journal of Oman Studies*, 5, 1975: 123-157; Derek Kennet, *Sasanian and Islamic pottery from Ras al-Khaimah: classification, chronology and analysis of trade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Archaeopress, 2004.

〔图五〕威廉姆森在锡而詹地区所采集的中国陶瓷标本



主要通过海路运输至波斯湾西亚地区，这一点毋庸置疑。一旦进入内陆，即便在A或Q区域这类紧邻沿海地区的采集点，中国陶瓷的采集量也是骤然下降，似乎一旦进入伊朗大陆中国陶瓷便销声匿迹了。下面我们追随零星散布的中国陶瓷，结合采集地的历史特征，简要分析一下中国陶瓷与各地的关系。

虽然当年威廉姆森调查采集时的意图无从知晓^①，但其足迹所涉之处基本都在古代贸易运输网络的驿站。大体可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米纳布—克尔曼地区(K、AA、L、Q、P、Z、S区域)，运输线路主要穿越杰巴尔巴莱兹山脉(Jebal Barez)呈南北走向。西部布什尔—西霍尔木兹甘地区(F、H、J、A、B、D、AE区域)，运输线路散布在扎格罗斯山脉(Zagros)群山之间，主要为了沟通设拉子与沿海地区。

其次，虽然内陆地区遗址采集点少，但是各遗址之间仍旧存在具体差异。锡而詹(S区域)位于沟通东西向设拉子到巴姆，南北向米纳布到克尔曼城的“十字路口”上^②。这里所采集的中国陶瓷虽以白瓷为主，但瓷器种类表现出连贯性〔图五〕。说明锡而詹存在中国瓷器的长期市场。除了作为贸易中心以及克尔曼地区最大的城市之外，锡尔詹在十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中叶还是一种施白色化妆土的伊斯兰陶的手工业中心^③。这种白陶工艺发展，尤其是碗类产品，与唐宋时期进入到伊斯兰世界的中国白瓷密切相关^④。这里采集到相对大量的中国陶瓷标本或许与当地陶业生产有关。锡尔詹地区以外，吉罗夫特(P区

① 由于缺乏威廉姆森本人对于历次调查初衷的陈述，我们很难了解到调查的路线、具体目的。见Seth Priestman, 2005, pp.24.

② Al-Muqaddasi, 2001, pp.370-371, 382-383.

③ 1969—70年，威廉姆森曾经在锡尔詹进行地面调查和小范围考古发掘，虽然没有找到窑炉遗迹，但是在蓄水池中发现大量支烧工具，判断附近存在陶窑遗迹。发掘资料在威廉姆森过世后被整理发表。参见Peter Morgan, Janet Leatherby, 1987, pp.23-172.

④ Oliver Watson, "Islamic Pots in Chinese Style",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129, no.1010, A Special Issue on Ceramics and Glass, May, 1987, p.204.

域)、玛奴垭(Q区域)两处遗址采集点发现的中国陶瓷种类也呈现时代上的延续。这两处地方相比普通驿站有一定政治、宗教地位。吉罗夫特城10世纪时是克尔曼地区的行政中心，在塞尔柱王朝(1037—1194)时期继续发展，一度成为冬季首都⁴¹。玛奴垭则是在10世纪以其城堡和清真寺而著称，被誉为克尔曼的“巴士拉”⁴²。由此可见驿站城市的规模、政治、宗教地位与中国瓷器的发现密切相关。

除威廉姆森藏瓷以外，伊朗大陆还有两处中国瓷器的传世收藏：阿尔德比神殿藏瓷和现藏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部分中国瓷器。后者相当一部分的元明中国瓷器是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从大不里士萨法维皇宫劫掠的战利品⁴³。这两处收藏所包含的大量元代至正型青花瓷器和明代官烧青瓷可谓独树一帜，伊朗大陆再无他处可与之相比。由此联系威廉姆森藏瓷的伊朗内陆地点，巨大的反差再次凸显中国陶瓷在伊朗境内与皇室、政治、宗教权威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远道而来的中国瓷器从波斯湾北岸港口登陆，一旦进入伊朗市场，绝大部分都流向皇宫，再就是地方行政、宗教中心、商贾云集之所，以及为了仿制中国产品的手工业中心、陶瓷生产地。

通过梳理威廉姆森藏瓷的大致分布状况，我们得以了解波斯湾北岸地区贸易海港的变迁与陶瓷贸易路线的走向：在港口变迁方面，通过中国陶瓷的分布可以得知，伊朗南部地区与中国古代的贸易中心从上波斯湾地区逐渐下移至阿曼湾。中国瓷器在伊朗与皇室、政治、宗教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集中出现在贸易交通的重要城市。从锡而詹地区采集的标本和当地生产釉陶品种可见中国外销瓷不仅自身价值高昂，对当地陶器发展也产生了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张 然，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
翟 毅，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Jean Aubin, “La question de Sirgân au XIIIe siècle”, *Studia Iranica*, 1977, fasc. 6, p.286.

<2> 前掲德里克·康耐特、张然、赛斯·普利斯曼：《近东地区考古已发现的龙泉窑瓷器—英国威廉姆森藏品及斯拉夫遗址调查藏品中的龙泉窑青瓷简介》；Ran Zhang, *An Exploratory Quantitative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and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Ceramics Trade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AD c. 800-1500*；林梅村：《波斯湾古港的变迁——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一》；Lin Meicun, Ran Zhang, “Zheng He’s voyages to Hormuz Islan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tiquity*, 89(344)；Lin Meicun, Ran Zhang, “A Chinese Porcelain Jar Associated with Marco Polo: A Discussio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3> Julian Raby, Ünsal Yücel, “Chinese Porcelain at the Ottoman court”, i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Regina Krahl, Sotheby’s Publications, London, 1986, vol. 1, p.33.